

难忘的仇恨

老工人回忆录



福建人民出版社

6119

难忘的仇恨

老工人回忆录

福建省总工会宣传部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64年2月·福州

难忘的仇恨

老工人回忆录

福建省总工会宣传部編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福州得貴巷18号) 福建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001号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張1 13/16 字数38,000 印数1—50,000
1964年2月第1版 1964年2月第1次印刷

統一书号: T3104·186 定价: (5)一角四分

前 言

本书收集的是省内外一些老工人的回忆录，也是一部叙述他们在旧社会遭遇的血泪史。从这里，我们看到在反动统治者和剥削阶级的残酷统治、压迫和剥削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过着多么悲惨的生活，受着多么沉重的灾难，以及他们在同压迫者和剥削者进行斗争中又是多么英勇顽强，这是对旧社会无情的揭露和控诉，也是关于什么是阶级压迫、阶级剥削和阶级斗争的具体生动的说明。

在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是一个自始至终充满着阶级斗争的时期，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曲折的。为了在这场斗争中取得胜利，就必须反复地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思想重新教育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

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除了很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深入实际，参加现实的斗争外，有旧社会受过苦难的人想想过去的阶级压迫、阶级剥削，在新社会成长起来的青年人了解一些过去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历史，是大有好处的。懂得过去，才能懂得现在。只有看清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丑恶，才能更加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美好；对旧社会有着刻骨仇恨，才能对新社会有无比的热爱。我们编辑这本书，就是为了让老一辈和年轻一代的人，都能从中受到一些活的阶级斗争的教育。特别是广大的青年工人同志，他们是长在“背后没有敌人的鞭子，肩上没有沉重的担子”的新社会，对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过去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痛苦生活缺乏深切的体会，通过这些老工人的回忆录，他们就能得到一些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知识，以便进一步提高阶级觉悟，辨明是非，站稳立场，坚定社会主义方向，并把老一辈工人对旧社会的刻骨仇恨，对新社会的无比热爱，以及他们的革命思想和革命经验继承下来，把无产阶级光荣的“家谱”，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目 录

要革命到底.....	朱英如 (1)
我的三十年.....	郭可銀 (9)
旧社会是地獄	
新社会是天堂.....	陈淑芝 (18)
我当学徒的时候.....	林建华 (24)
“卖身契”.....	陈宗玉 (31)
伤疤恩仇記.....	何永安 (34)
林場旧恨.....	李承福 (39)
我家的变迁.....	陈大妹 (43)
三輪車工人的今昔.....	张增福 (46)
“九命沉冤” 今雪恨，党的恩情記心間.....	阮宝玉 (50)

要 革 命 到 底

上海国棉十七厂退休老工人 朱英如

我生长在旧社会的一个穷苦人家。父亲从事重体力劳动。我三岁时，父亲因为过度劳累，当场吐血死在工地上。母亲带着我们姊妹三人，怎么生活呢？很多人劝母亲把我送去当童养媳，母亲不肯。因为我母亲自己就受过当童养媳的苦，我姐姐也是当童养媳被折磨而死的。到了七岁，没有办法，我被迫给地主放牛。奴隶生活便从此开始了。有一次晒谷子，很多鸡跑来啄，我赶了一群，又来了一群，地主看见了，不分青红皂白，一铁锹打过来，血流如注，至今脸上还留下一道伤疤。母亲知道了很心疼，托人把我从地主家里接回来。以后母亲当保姆，把我带在身边，我也帮着母亲拣柴火，做零碎事。到了十一岁，我又给资本家当婢女。伺候的是一个大烟鬼，他抽烟，我搥腿，一打瞌睡，他就用烟钎戳我。一次给他捧茶，不小心把茶杯盖子打破了，挨了毒打。痛苦的生活折磨得我想自杀，把盐泡在开水里当盐卤喝，当然，这样是死不了的。

十三岁时母亲用几年来做针线积下的一些钱，托人把我介绍到上海英国人开办的怡和纱厂去做工。过去做工，尤其是女工，真是牛马不如。进出厂都要搜身，一天干十六小时，上午四点上

工，下午八点收工，家里沒钟，掌握不了時間，只好半夜起来看月亮，阴天什么也看不到，弄得覺也不敢睡。晚上走路也不方便，流氓很多，小姐妹只好結伴同行。在厂里挨打受罰更不用說，只要是五六十岁的老紡織工人，至今身上都留有伤疤。女工怀了孕不敢說，怕被停掉工作。生了孩子也沒人照顾，有个女工把孩子放在家里，自己去上工，晚上回家，发现孩子的肚腸被猫抓出来了。她哭，我們也哭。这种慘狀，又何止一个，当时农村破产，社会上失业很多，多少人冬天沒棉衣，冻死在馬路上。这种情况，当时我认为是我們穷人命苦。算命先生說：“今世不修来世苦”；“要享来生福，今生多念佛”。为了寻求寄托，我年紀輕輕的就成了虔誠的佛教徒，每天做工后就烧香念佛，紗厂姊妹給我起了个外名叫“吃素姑娘”。其实，那算命先生的話是騙人的，信了教，我还不是一样当牛馬！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枪杀了中国工人顧正紅。五月三十日英帝国主义分子在南京路上，对手无寸鉄的上海工人、学生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群情激憤，全市工人起来罢工，接着学生罢課，商人罢市，在党的领导下，上海人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斗争。就在这些动蕩的日子里，我和小姐妹們一起参加了群众大会。在这次会上，我第一次听到一位年輕的共产党员讲革命道理。他問我們，工人为什么受苦，工人和資本家究竟誰养活誰，男女为什么不平等，等等。接着他又告訴我們，工人所以受苦受难，牛馬不如，随时被人枪杀，并不是工人的命不好，而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害的。工人只有团結起来，組織工会，起来斗争，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打倒反动派才能翻身。听了这些話，我心里想：“对啊，要是我受苦是命

里注定，难道千千万万的工人和穷苦人的命运都該这么苦么？”我就这样逐漸觉醒过来了。从此我积极地参加各种活动，并参加了工会組織。当时党在工人中办夜校，刘少奇主席、楊之华大姊都是夜校的老师。他們教我們读书，給我們讲道理。革命道理打开了我的眼界，使我知道世界上已有一个工人阶级当家的国家，那就是苏联，在那里工人阶级真正翻了身，男女平等。听了这些，我渾身是劲，积极动员小姊妹們上工人夜校，参加群众集会，听共产党人和工会领导人的演讲。斗争锻炼人，斗争教育人，在这些活动中，我懂得了許多革命道理，觉得自己身上产生了一股力量。就在这一年夏天，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刚参加党的时候，我只想到要争取自由解放，要生活得象个人，就得要斗争。我們向资本家提出要办夜校，让工人读书，要增加工資，不許无故打人罵人。当时好多厂的资本家开除了大批工人，被开除的都是党、团员，积极分子。我所在的工厂，资本家害怕工人和他斗争，答应了一些条件。如办夜校，但不許办在厂里。为了監視和破坏我們的活动，资本家也派人参加識字班，进行捣乱。在厂里，我在小姊妹中积极组织“姊妹团”，在男工中組織“兄弟队”，通过各种方式把工人組織起来，发展工会。资本家当然也就把我看成是眼中釘，千方百計想把我拔掉。

一天下班后，我正准备出厂开会，资本家的代理人在門口拦住了我說，“阿毛姊（这是我过去的名字）你工作蛮好，我想升你做招工，每月工資四十元，而且招一个工人，人家还会送一份厚礼。……你可以退出工会。”我心里想，这是收买我了，我冷冷地說：“我没有資格做招工，我做不来。”资本家代理人一听，便面孔一板，直截了当地說：“我知道你是女工的总代表，

你退職吧，我一次發給你退職金五百元”。我嘲笑說：“我們靠做工吃飯，五百塊錢我不要。要嘛，你开除吧！”他只好尷尬地走了。

當然，國內外反动派是不會讓革命人民抬起頭來的。“五卅”大罢工后，帝国主义勾結軍閥對上海工人運動進行殘酷的鎮壓，他們查封了上海總工會，逮捕并殺害了工人領袖、優秀的中國共產黨人劉華同志。一九二六年春天，我所在的工廠在一次罢工中也遭到了鎮壓，資本家乘機開除了三分之一工人。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把男工女工都組織起來，抱着有飯大家吃、有難一起當的主意和資本家作鬥爭，我們約定舉行罢工，在同一時間內把車关了。誰知敵人早就作好了對付我們的準備，一關車，敵人立即在車間抓人，一下子被抓走二十六人，還打傷了不少。當時我們還沒經驗，罢工遭到失敗，六個工人犧牲在國外監牢里。這件事說明了我們工人階級不掌握政權，就沒有自由，連生命也沒有保障。當時敵人到處在抓我和其他為首的兩個人，還揚言只要抓住三人中的一個，就把被捕的全放出來。但沒有一個工人去告訴敵人，反而更加小心掩護我。我就在兄弟姐妹們的掩護下，離開了被警察包圍的工廠。于是，我失業了。

一九二六年五月，上海工人派我和其他同志到廣州去出席第三次全國勞動代表大會。當時大會交給上海代表的任務，是把上海工人進一步組織起來，和軍閥作鬥爭，迎接國民革命軍北伐。回到上海，我被派到閘北去組織絲廠工會，不久擔任了絲廠工會主任。我們的任務是組織工人，宣傳革命道理。

一九二七年，黨接受了一、二次武裝起義的失敗教訓，重新組織第三次武裝起義。周總理當時是領導人之一。我們包圍了敵

人的司令部、警察局，面對面和軍閥作鬥爭。雖然我們武器少又不好，但我們都很勇敢。打了兩天一夜，到三月二十二日，我們勝利了，總工會也恢復了，開除的工人也復工了，黨組織了統一戰綫，革命影響擴大了。不久，北伐軍就進入了上海。

正當上海工人和人民為了大革命的勝利而歡欣鼓舞的時候，當了帝國主義走狗的蔣介石叛變了革命，他向中國人民伸出了罪惡的血手。四月十二日，蔣介石發動了反革命政變，殺害了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同志，解散了上海工人糾察隊。四月十三日蔣介石又命令反動軍隊向示威的工人群眾開槍屠殺，寶山路上一時血流成河。這一天，我也在示威群眾中，親眼看到許多階級兄弟在敵人槍林彈雨中倒了下去。白色恐怖籠罩着上海，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不斷被逮捕，被屠殺，總數不是幾十幾百，而是成千上萬。在這黑暗的日子裡，雖然天天都有坐牢殺頭的危險，但我不怕，我只感到為了革命就是犧牲也是光榮的。每一次聽到同志們犧牲的消息，我除了悲憤外，就想到自己的肩膀又多了一副擔子，需要加強工作，繼承同志們的未完的事業。

根據黨組織的決定，我從閘北轉移到浦東工作。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我被捕入獄。一抓進去，就打嘴巴，一掌打下來，眼前盡冒火星。但我沒流一滴眼淚，我認為為革命而犧牲是光榮的。我一面挨打，一面大罵，於是他們又改用鞭子抽。鞭子抽在皮膚上，火辣辣地，只感到肉要撕開似的。我用最大毅力忍住不叫一聲。敵人沒辦法，把我關到號子裡，衣服被血粘在皮膚上，痛極了，我咬緊牙。以後我被判了四年徒刑。

革命到處都有鬥爭。在監獄裡，我和幾個政治犯建立了聯系，同時利用一切機會接觸其他犯人，組織難友為改善生活、取



消私刑而斗争。那时监狱里有許多黑暗制度，女犯人稍有违抗，就要“跪釘板”。当时，我們向看守人提出，如果不取消这个制度，我們就絕食，看守人没办法只好取消了这项私刑。

在被捕的时候，我已經怀孕几个月，直到快临盆时监狱当局还不准出来分娩，甚至不給生孩子所需的用水。难友们知道以后，就把自己吃的一杯杯开水省下来，为孩子洗身。我给这个在苦难中诞生的第一个孩子取名“獄生”。看守还要我把孩子交出

来，送到天主堂去收养，我拒絕了。看守說：“你是有罪的，死后要进地獄，让孩子长大后做个神父，就可以拯救你的灵魂。”我气愤地說：“我的灵魂不需要拯救，你这个帝国主义走狗，才是个肮脏的灵魂。”孩子最后保全下来了。滿月以后，托人把孩子送到自己的家里。当我出獄的时候，他已經四岁。出獄以后，先住在青浦的夫家。我丈夫是个店員，家庭生活是困难的。經濟上的困难倒不怕，真正的困难，在于刚入獄的时候，还能和獄外党的組織保持联系，而在出獄的前一年，联系中断了。为了这，我决心回到上海，到工厂做工，找寻党的組織。

这是一段十分艰难的岁月。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共产党的組織遭到严重破坏，过去熟悉的同志，有的牺牲了，有的离开了，有的掩蔽起来了。也有一些人，經不起考驗，投敌叛变了。找寻党的組織是多么不容易啊！我跑了几家工厂，人家一了解我的过去，就拒絕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临时工做，因为反抗資本家的无理压迫，狗腿子說我是“搗乱分子”，又被赶了出来。以后，我做过小販，做过佣工，住过难民所。在难民所里，因为我罵了蒋介石，又被赶了出来。

抗日战争爆发了，我进了玻璃厂，做宿舍管理員。有了固定的工作也就有了工作的陣地。那个厂的青年工人很多，我給他們讲大革命斗争的故事，讲抗日救国的大道理，引导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从此，宿舍就成为进行抗日活动的場所。

抗日战争结束后，党在上海的地下組織，积极开展工会活动。一位党的工作者来到玻璃厂，我終於找到了自己的組織，第二次得到了政治生命。我多高兴啊！这时，虽然我已經年近五十，但能重新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我感到自己越发年青了。我积

极投入了上海人民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同时负责保管党的文件和分发党的宣传品。在党的教育下，就在我们经常来往住宿的三十多个小小工人宿舍里，有四分之一工人先后参加了共产党。

我自己的孩子“狱生”也长大成人了，并且进了中学，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一九四六年，这个在苦难中诞生的孩子，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内战，被中国人民彻底击败了。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上海终于获得了解放。我从自己亲身经历中，体会到政权是多么可贵啊，它是无数烈士的鲜血换来的。今天工人的头可真是抬起来了，妇女也真正翻了身，过去的苦难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过去，今天，我们的敌人还存在，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者和反动派还在千方百计污蔑破坏我们，国内外阶级斗争还很尖锐复杂，我们绝不能忘记阶级斗争。

今年，我六十四岁了。从一九五五年退休以后，我就参加街道里弄工作，被选为里弄居民委员会副主任，和这个地区的党支部书记。我参加了上海老工人讲师团，经常到各个工厂、学校、机关、团体做报告，讲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在我退休的第二年，在一次小型座谈会上，会见了当年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周恩来同志。我同他握手的时候，问道：“周总理，还记得起朱英如何？”周恩来同志看看我，记起来了，很亲切地问起我的近况。当我告诉他已经光荣退休后，周总理说：“从工厂里退休了，革命是不能退休的，我们要永远革命下去。”

我牢牢地记住了周总理的教导：“要永远革命下去！”

苏 田插图

我的三十年

福州火柴厂 郭可銀

徒工生活 牛馬不如

我家原住福州市郊郭宅乡，祖父和父亲因为在农村受尽压迫剝削，生活过不下去，都跑到城里火柴厂当工人。两个人虽說找到工做，掙到的錢却填不飽肚子。

一九三四年，我十三岁了。家里央人讲情，也把我送到建华火柴厂当学徒。进厂的头一天，大主管王营倌(老板的亲戚)先对我宣布了一套“厂規”，接下去說：“要当学徒可以，不过你要听清楚，学艺的五年中間，工錢分文不給，干活要老老实实，要是偷懶耍滑头，可別怪老子无情！”

悲慘的学徒生活开始了。每天清早五点钟，我們当学徒的就要去上班，一直干到晚上十一点多钟，每天都得干十三、四个钟头，到下班时累得全身骨头象散了架似的。工厂的設备非常恶劣，我們的工場就象猪舍一样，用木板胡乱釘起来，又脏又悶，又低又暗，伸手就可以摸着屋頂。“夏天是蒸籠，冬天是冰窟。”劳动保护根本談不上，工伤事故成了家常便飯。有一天，工人林德安的孙女剛上完夜班，一連干了十几个钟头，又餓又乏，狠心

的資本家却硬迫着她再干日班。当她强打精神去上工时，由于过度疲劳，一时支撑不住，用破麻袋做的围裙被机器咬住，整个人被卷了进去，肚皮被揭开来，机器立时染满鲜血。等大伙把她救下来送医院时，在半路就死去了。我們成品車間从运火柴枝一直打到打篾包装等八、九道工序，全部是手工操作。我打篾繞着工作台轉，一天要轉上三百多圈，就象驴馬拉着石磨团团轉，头都轉暈了，手脚还經常被竹篾割得皮破血流。



生离死别 家破人亡

一九三七年，我的老祖父已經年邁体衰。資本家把我祖父的血吮干了，看看没有什么“油水”，就把他撵了出来。祖父失业了，到处找不到事做，只好在家里生悶气。祖母、母亲做的竹器沒有銷路，也停了下来。我和父亲在厂里做工，資本

家拖着不发工錢，沒有能力接济家里，家里的几口人只好常常断炊。为了一家人糊口，母亲含着泪，忍痛把我最小的一个妹妹卖掉，卖的錢还被伪保长从中勒索去一部分。卖妹妹的錢很快就用光了，生活仍然沒出路，母亲只好扛着鋤头，到乡下去拣番薯（人家收获后遺漏下来的）、挖野菜。一天，母亲拾了一小籃碎番

薯和野菜，拖着疲憊的身子从閩侯尚干回来，还没开口，我的父亲悲痛地说：“孩子他妈，我对不起你，昨天我把娣娣卖到永泰去了。”娣娣是我的大妹妹，那时已经十二岁了，母亲听到这件事，一时哭得晕了过去。接连从母亲身上割去两块肉，做母亲的怎么不心疼啊！

祸不单行，旧社会工人家的灾难，一个跟着一个。我的叔父被抓去当壮丁了。不久祖父又饿死了。老祖母过于伤心，哭得两眼红肿，失明了。第二天，我的姑母赶来，带来几块钱买不起一口薄木棺材，只好买了几块木板，自己钉起来，把祖父收埋了。

我和父亲半饥半饱为老板卖命，仍然顾不了家里。于是，家庭的生活重担全搁在母亲一个人身上。母亲经不起常年累月的折磨，终于染上了病，没有钱请医生，不几天，母亲也死了。我的祖母自从祖父死后，哭坏了身体，接着也去世了。亲戚、朋友和我家一样穷，无力帮助。祖母、母亲死后不说买棺材，就是买几块木板也是买不起啊！父亲只好把家里的一些零星木板拼拼接接，钉成木槽，收殓起来，抬到后山埋葬。死的死了，卖的卖了，抓的抓了，我的一家就这样家破人亡。

餓了工人 肥了老板

不久，日本鬼子占领了福州，建华火柴厂搬到南平。

在南平，我们工人受的苦难更加深重。大老板林弥鉅知道我们回不了福州，就想方设法，更残忍地剥削工人。那时候，他实行一种“定额制”，以米作工资。规定：男工每天打簍十三件，发糙米一斤十小两；女工装盒二十盘，发一斤四小两。没有完成定额的，一粒米也不给。资本家发的“工资米”霉烂不堪，吃下

去就拉肚子，我們的身體越拖越壞了。狼心狗肺的資本家還進一步吮吸工人的膏血，用“罰工”和扣“工資米”等種種辦法，來剝削我們工人。我們只要遲到幾分鐘，或是不小心踩破了地上一個火柴盒，就扣一天的糧食，還用“開除”來威脅我們。可是，工資米却一拖再拖，幾個月都不發。有時發了一點爛米下來，資本家豢養的那班監工，又從中舞弊，剋扣起一部分，拿去換粉干、魚肉，大吃大喝，根本不顧工人死活。

工人沒有糧食吃，只好利用工余時間上山挖竹筍、采土木耳來充飢。我們餓着肚子，每天還要干十幾個鐘頭的活，不久，工人生病的很多，有打擺子的，有水腫的，有痢疾的……老板對生病的工人不但不幫助治療，還硬逼着帶病上班。那時我打擺子很厲害，發冷時還能勉強干活，發高燒時就無法支持了。可是老板管你能支持不能支持，要你上班你就得上班。林弼鉅豢養出來的一伙狗腿和監工，賣力地監視着我們。我病得不行，好幾天定額沒有完成。和我一起干活的鄭依指僥倖沒有生病，他很同情我，起早貪黑拼着命干，盡量多做幾件，把多餘的件數悄悄地拿給我，讓我湊滿定額，能夠領到一點霉米度日。可是有一天被監工江得斌發現了。這個壞傢伙如狼似虎地猛撲過來，揪住我的破麻袋衣，罵道：“你這小子好大胆，竟敢投機取巧！”說畢，用力把我一推，我差點栽倒下去。他又轉臉對鄭依指說：“原來是你干的好事！好，今天連你的工資糧也不發給，讓你喝西北風！”在舊社會，我們工人兄弟連講一點階級友愛，也成了“罪過”啊！

悲慘的學徒生活熬過去了，我出了師，學到了一手打簍的技術，心里真高興啊！可是不久，我的心就冷了下來。說實話，打